

有關五四運動，政治方面，傅教授已有極清楚的闡明。在這時期，西洋文學對中國社會有着極大的影響力。易卜生（Ibsen）的作品給中國婦女界帶來無限的生命力，其他的所謂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賽先生（Mr. Science），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真理和災害。五四以後的中國，為傅教授寫來栩栩如生，給人帶來無限的遐思和感慨。

第七章述說十九及二十世紀之中國和西方，傅教授說這時期歐洲人對中國的觀點有其獨特的見地（頁一四〇）。在敘述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時（頁一四四至一四五），傅教授極正確地指出，直至最近，西方人對中國研究，大多集中於語言（Philology），而少涉及有關文化的方面，這點當是西方人為了方便對華擴張而如此做法。目前西方人對中國研究，和從前比較，當有不同之處，然而他們學習中文，目的只望能利用中國文獻而已（able to make use of Chinese sources historically），他們對中國人的思想、意見，是盡量不予以重視的。換句話說，他們只希望利用中國人的史料來研究中國，而不利用中國人的研究成果，過去十多年的中國（頁一四九），絕不想主動去瞭解西方，也不主動要求西方承認中國為世界強國之一。然而，中國經過整整半個世紀的不安，加上過去廿年來種種變幻，中國是否已逐步治愈了她的創傷，抑或正一步一步地步向死亡，這是一般人——尤其是那些所謂 China-Watchers ——所感覺興趣的。

本書雖從德文翻譯成英文，（譯者為 T. S. Wilson）但文字方面仍然流暢易懂。書末附加之中國朝代編年及中西交往重要年表，對一般讀者來說，極為方便，至於參考書目，更能幫助讀者對這問題作進一步的追索。總而言之，本書雖有些微缺點，然這也只是觀點和見解的不同而已。同時，本書內容是從古代到現代，傅教授已盡量做到合乎讀者，特別是西方讀者的要求，已是一件絕不容易的事。筆者認為，在有關中外關係書籍中，傅教授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

趙令揚

*Die Entwicklungspolitik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49 bis 1962: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r Technologischen Grundlage. By Dr. U. E. Simoni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8. pp. 179. US\$ 5.00.)*

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間，筆者在西德佛萊堡大學（Freiburg University）時，德友席慕尼博士（U. E. Simonis）對中國問題發生濃厚興趣，當時他已大學畢業，以專員

的身份在有名的 Arnold Bergstraesser Institute 從事經濟問題的研究，並且跟隨約漢遜（R. Johimsen）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爲了博士論文，席先生經常跟我談論論文的題目問題。我以爲當時的德國學術界對中國問題之研究還不超出傳統的漢學研究範圍，對中國現代經濟問題很少有可讀之書。席先生既然是經濟學家，而且是對中國發生興趣，因此我乃建議對台灣或大陸的經濟發展做一專題研究，希望藉此收一點拋磚引玉之功，替德國學術界開拓一條研究中國問題的新門徑。其後約漢遜轉任教于基爾（Kiel）大學，席氏也隨他前往。因爲基爾有一著名的世界經濟研究所，收集中共資料甚豐，也因這個關係，席氏乃決定將其博士論文寫中共經濟問題。一九六八年，席氏以極優異成績獲得學位，且論文由柏林出版社 Dunker & Humblot 印書出版，頓時很受各界重視，一舉成名。那時，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教，出版商在著者之要求下（當時他已受西德政府委托，到非洲當桑比亞總統之經濟顧問，並處理西德對該國的經濟援助問題）送來一本，要我寫書評。可是因本港沒有適當的雜誌可以發表，書評也就一直沒有動筆。去年筆者再度歐遊，而席氏亦由非洲返回基爾大學，在見面時他問及此事，使我感到不安。最近全漢昇先生囑我就德國學人最近發表有關中國問題之書籍撰寫書評，在他主編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發表，我想這是完成對吾友筆債之大好機會，乃樂爲之。

本書之目的在應用近代經濟科學之方法分析中共取得政權後頭兩個五年計劃所應用的經濟發展策略。全書一七九頁，共分五章。首先討論一個國家在求經濟發展時，應怎樣選擇所應用之生產技術，以適應該國之特殊情形。因適當生產技術之選用，要視一國之特殊環境而定，故作者乃於第二章中介紹中共之經濟社會之特殊結構，允爲全書討論之基礎。第三、四兩章，分別分析第一期（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及第二期（一九五八——一九六二）五年計劃之經濟發展策略。最後試就中共之研究結果找出一些基本法則，以供其他發展中國家之借鏡。

本書最大特點，在研究中共經濟發展之策略，換言之，在研究中共解決其經濟問題的方法。在策略上，中共前後兩期的五年經濟計劃顯示重大的不同，第一期的重心在發展重工業，所應用的是資本集約（capital intensive）之生產技術，所建立的是一貫作業的大工廠。反之，第二期的重點，則在輕工業及農業部門，所應用的是勞力集約（labour intensive）之生產技術，所建立的是中小型工廠。套用現代經濟成長理論之術語，我們可以說中共第一期五年計劃是偏向不平衡發展（unbalanced growth）之理論，第二

期則逐漸走向平衡發展（balanced growth）的道路。不平衡發展是一種重點的、優先的發展，其好處在於將有限的資源——尤其是資本——做有效的集中應用，而使某些特定的工業部門獲得突出的發展。可是不平衡發展很快會造成生產結構之脫節，發生所謂瓶頸現象（bottle neck），從而也影響到那些優先部門本身的發展。故為使這些優先部門本身能繼續發展下去，其他有關的輔助工業非跟着發展起來不可。中共經濟企劃者有鑒於此，乃於第二期之五年計劃中由重點發展轉移到平衡發展，其間應用較傳統的生產方法，將農業、輕工業及勞務部門等也發展起來。是以我們大概可以說，經濟在開始發展的第一階段，因為可用資源有限的關係，通常採用不平衡發展的策略，來達到經濟起飛之目標。可是一旦經濟開始起飛後，這時一般工業部門非跟着發展不可，否則經濟起飛將會無法持續下去。優先發展與平衡發展之說，在我們看來並不是互相牴觸的，而是在時間上前後互相為用的。

發展中國家常遇到的一個問題，是在生產技術上的選用。它們的生產技術往往分佈在兩極端上面：一方面是古老的、「祖傳」的傳統生產方法，他方面是由西方輸入的高度複雜的生產方法。固然前者的生產效能不高，是經濟落後的象徵，但後者雖有較高的生產效能，然而它的應用有其先決的社會經濟條件，而這些條件在落後地區大都不能存在，故勉強加以應用，也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發展的效果。滿清時代中國所提倡的洋務運動之所以不能把中國「經濟的引擎」發動而起飛，也就是犯了這個毛病。因此理想的境界，是在選用一套生產技術，使它能配合一國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特殊情況而獲得最高的產出效果。而這種技術，一方面較之傳統的「祖傳秘方」有更高的生產能力，同時就其所需的資本投資來看，也較之現代化的西方生產技術為低。這種技術是界於兩個極端之間，故一般人稱之為「中間技術」（intermediate technology）。中共在其第二期的五年計劃中所應用的經濟發展策略，便是建立在這個「中間技術」上面。

在理論上「中間技術」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中間技術」只是理論上的一個用於幫助分析現象的輔助概念而已，其具體化有待於研究各國的特殊經濟結構而後定。因為「祖傳秘方」與現代技術兩極端之間，有很多的層次（spectrum）可以移動，因此能適用於一個國家的「中間技術」，不見得能應用於他國。「中間技術」既然缺乏普遍適用性，故一國在選擇適當之生產技術前，先要將自己的特殊經濟情況搞清楚。生產技術既然要與經濟結構相配合，則西方現成的、以節省勞力為目的的生產技術，很少能直接有效力地應用於勞力過多的落後地區。因此，「中間技術」之選擇，其成功與否決定於下

列兩大因素：第一，依各國特有的經濟結構將現成的西方技術加以修改；第二，自己發明適宜於本國經濟狀況的新技術。許多落後國家，一方面沒有發明新技術的能力，他方面盲目地將西方高度複雜性的工業技術整套搬過來，建立嶄新的一貫作業大工廠，當做敷衍的進步的象徵。這正是為甚麼工業化在很多落後國家不能成功的原因。總之，儘管「中間技術」在概念上是如何的美，但在具體化上，有其不可克服的困難，因此我們對它的實用價值表示懷疑。

中共經濟隨第一期五年經濟計劃的實施而進入起飛階段。本書作者雖一再強調以無價值判斷的、客觀的學術立場來分析中共的經濟，以為中共的經濟確在進展之中，且以為其所應用的經濟發展策略——所謂「中間技術」的策略——可為其他落後地區的楷模。「中間技術」的可用性，我們早已表示懷疑，已如上述。至於經濟科學是否是一種無價值判斷的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更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共經濟建設的成就，是以犧牲人民自由的重代價而獲得的。人民的自由個個都得犧牲，經濟建設的成果不一定人人都能分享，結果把「自由」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後，中共的福利函數(welfare function)是否真的比以前達到更高之境界，是值得再加仔細考慮的。

林聰標

### 明代西藏史研究 (註一) 佐藤長

佐藤長先生在西藏史的研究方面，不但是日本，也是世界極少數著名學者中的一位。他曾在北平的喇嘛廟中就過三年，專心一志的學習西藏語文和歷史。返日後他繼續不綴，一直在這方面用功。十年前，他的巨著古代西藏史研究 (註二) 問世，這是他二十年來心血的結晶。此書一出，借用西藏佛教學者稻葉正就的話：使原來在西藏研究上較歐洲落後的日本，一躍而超越了世界水準。(註三) 但此書所記，止於唐會昌元年 (八四一年)，因此，他以後廣續前業，發表了不少獨創性的論文，尤以論明代的部份為最卓越。上述的古代西藏史研究，早有定評，毋庸贅言。至於明代的部份，因散見於各叢書或學報，似較乏人注目。現在就從這方面，作一總括性的評介。其中包含了以下諸文：

註一：所謂「明代西藏史研究」者，乃指四篇論文而言，詳見本頁正文及註四至註七。

註二：原題為：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刊行。上冊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下冊翌年十月出版。共九三五通頁。

註三：東洋史研究，十八卷一號。